

何平、宋毅菲、邱楚译、张瑞洪、邱玉洁等5人正在讨论中

# “90后”作家近作分享：探寻隐秘新生的文学现场



对读层读书会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发起，通常以一部作品为楔子，围绕某一主题由此放出去，不限于单一的作品本身。一般讨论成果会整理发表于公众号“送你一朵花戴”，公众号后续会开放评论区留言功能。对读层是大气层的最底层，其中生成的每一阵风、每一滴雨都与大地上的人们息息相关，一如文学。

**何平(主持人语)：**这个时代需要青年的声音。当我们重返文学现场，去聆听种种初探笋尖的发声者，去探寻丰富的新生的隐秘生态机制，我们会逐渐摸索到许多尚未成型，但更加自由、野蛮的文学与审美，填充这层被忽视的一隅，是极其有价值的。本期读书会，我们各自选取一位2022年有新作问世的“90后”作家进行讨论，深入文学现场去感受青年写作者的温度。

**◎宋毅菲：**本次读书会我选择的青年作家栗鹿的新作《致电鼯鼠岛》，这部小说多被描述为作者栗鹿多年后回望过往，写给家乡崇明岛和儿时回忆的书。但栗鹿的此本“返乡”之作与格非、阿来等作家从逃离到漂泊、再到乌托邦回归的返乡之路截然不同，让我想起了季进老师在评价刘亮程《本巴》时提及的，充满梦境与现实、记忆与想象的“另一重返乡”。我不想去质疑这封“情书”中所蕴含的真切情感。作者记录海风、薄雾、轮渡、岛屿、木兰树，书写友人凭栏扶风的夜谈、少年青涩却故显成熟的情思，一个个字符编织成漂浮又厚实的画面，丰沛的恋乡之情几近要冲破文字表面溢出，与书本浑然一体。但与其说她对家乡的情思是幕后的实权操纵者，不如说这座“雾岛”更像是披着叙述主体外壳的处于虚实之间的象征物，是作者探索前方那令人前去又神秘的未知之物的密钥。《致电鼯鼠岛》的机遇像是天然生成，在过往的经验中，在偶然的巧遇中感知到莫名的召唤，“忽然，所有的材料都在脑海中涌现，一切都排列好了”，“雾岛”顺理成章地融入孩子的成长秘辛中。栗鹿更像是借助这场命定的返乡之旅来寻找自己，但为何寻找自己，归宿的终点是什么？她并不纠结于这些，“重要的是体验，一切从虚无中涌现，拥有名字，拥有深刻的内心感受。在回望中我与童年产生一种奇妙的重逢感”。

谈及“自我”，作者近年的创作显而易见地颠覆了早期的“我”，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与建构在《致电鼯鼠岛》这部长篇中更加鲜明。栗鹿在访谈中提及，自己过去写作时，“自我”是很大的，这似乎是很多新生代写作者，尤其是“90后”“00后”这一批作者中常见的现象。比如栗鹿早期创作的《杀死一个图书管理员》，其中的写作者与现实的写作者融合，“自我”无限膨胀到“神”的高度，认为写作的目的是无限地在自己建构的世界创造并为所欲为地建造秩序、编织混乱。而栗鹿后来的写作逐渐回归到“小的自我”，回归到生活经验的复现，回归到承认脆弱、关心他者的世界。随着个人的成长，栗鹿与我们一样越来越承认人的社会属性，越来越需要社会的交流属性。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的面貌不是凭空出现的，有多少个他者，就有多少个我的形象。我看到更多个自己，当他们的目光反射到我身上，才有可能继续写下去”。这种情愫，与我开篇提及的栗鹿在写作中看中的“重逢感”是一致的，它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栗鹿写作的质感。

相较于明晰的目的或强烈想要表达的冲动，栗鹿的写作更像是一种调和的直觉，其喜怒哀乐并不明显。对于过去的美好没有显出过分的留恋，对于迷幻的未知没有极致线性的痴迷和行动，对于成人的疏离残忍和命运的荆棘没有抵触与厌恶。一切处于混沌中，到来了就接受。正如在前文反复提及的，作者在追寻过去时也不知道问号前面是什么，这种重逢的体验能够带给作者足够的满足。因此我更倾向于把这种创作初始力理解为一种直觉，这与作者探寻于星空、雾、梦的原理相同。每个同样探索着自己过去与未来、梦境与现实的人一定会在作者关于“在寻找中重逢”的暗示下平静下来。充满隐秘与感伤的“雾”在我们不断的找寻中，终会凝结出实体与我们重逢，“人心的不安和彷徨像细小的沙石落入海中，最终裸露出岩石般的真相与力量”，尽管向前看。

**◎邱楚译：**我想介绍的青年作家是郑在欢。“少年”一直是郑在欢创作中聚焦的对象，在《今夜通宵杀敌》中，实存的少年经历“进化”长成了强悍的勇者，但作为意识、魂魄的少年却在反复的追溯与建构中，向着那不抛却原罪、拥抱一切的异托邦永恒前行，且在这种永恒中确立少年之不死不灭。

故事以倒叙、插叙的形式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发展，在回忆中建立了一个现实对过去的审判场，在循环往复的判决、反思中将少年置于永恒的真空环境，通过撞击生命的多个边缘，进行不断地建构和塑造。《不灭的少年》将亮亮这一“施暴/受虐”的双重角色与其少年之形永恒放置于握着卷刃的刀向“我”走来的瞬间。《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在不断的回溯中，将被追问者和追问者在对象的重构中进行颠倒，进而催生了一个保持好奇、不断对生命细节发出提问的少年思考者形象。作为认知、猎奇、探索的装置，此

形象的出现为少年进入异托邦提供了重要条件——赋予少年超越生死的权限。故事集中关于“生与死”的拷问也帮助了异托邦想象之建构。少年不仅是旁观者，更是亲历者，其精神在与死亡的不间断擦肩、相遇中渗透着对它的恐惧、敬畏、向往甚至是迷恋，由此达成生命的进化和延续。其中“迷恋”一色主要具象为主人公施加在比自己弱小的对象麻雀、蛤蟆甚至是同类身上的暴力、凌虐倾向。死亡在少年的手中被无限消解，对于生命的敬畏在此被置换成一种低级的游戏或是实验，少年从中获得了将最珍贵之生命全然掌控的快感，在那一瞬间，戏谑达到了高潮。荒诞、暴力、消解生命和死亡的氛围也成了永恒少年异托邦之基调，作为抵抗、熔铸、重构现实的有力武器。永恒的形成不仅基于对时空、生死之超越，还以凌厉、强盛的少年气持续地输入异托邦之建构，化作世界瓦解、凌辱中试图保全自己的伪装。

少年之特性，包括劣根性，在这个悬置于现实之上的异托邦中被无限放大，逻辑化为U型叙事结构的一部分，现实将少年置于不可逆的消解中。在其中，少年呈现了两种生命形态：一为在劣根性和原罪驱使下的不断沉沦堕落，二为在与世界碰撞中的塑形、改变、进化、成长。当现实回过头对昔日进行审视和拷问时，又会催生出一个被解放的永恒之“少年”，一个生长于现实却超脱现实的异托邦形象，一个肉体和精神被隔离的、碎片化的集合，故他无法与一开始的起点重合，而是处于平行、对望的关系。行至结尾，遥以回望，不难发现，在那个异托邦中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允许：肆无忌惮的性欲、毫无收敛的暴力，生死之间的自由穿梭。当戏谑之笑不再藏匿于虚伪的面具之下，被发掘的乃是血淋淋的青春和盛放的恶之花。

**◎张瑞洪：**我选择讨论的作家是出生于1992年的索耳，作为青年写作者，索耳用其野性的叙事思维书写历史和个人的异化。似乎这是他纠正庸碌现实所做的努力，正如过去先锋派写作和先锋派理论都声称要超越现实一般，索耳的小说也在日常经验当中提炼着对文本哲理性的追求。

索耳小说有一种形式自觉。自表现主义以来，形式实验和异化构成了现代主义写作的两面。这在“90后”写作者当中是极其稀缺的，毕竟新世纪前后，读者的审美经验发生过很大变化，众多作为形式的艺术作品(视觉艺术、文学和音乐艺术等)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现存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品味。而年轻一代的作家在形式感面前容易显得精巧，他们当然可以用“先锋”一词去指认这些精巧、智性、现代化的艺术品。但面对自身写作时，青年作家似乎更愿意去展示更真实、更和谐均衡的东西，似乎自内而外的超越更符合这一代人的格调。但在索耳的《与轴博士度过周末》《传世之宝(外二篇)》等小说中，作者一

段到底的叙事风格依然发人深省，形式不仅仅作为组织故事的手段，它还结构了作品的内里，这是写作者对人物机械化的独特观照。不论是励志炼出纯正的轴以抵消失败血统的“小男孩”(《与轴博士度过周末》)，还是走上阁楼就受到仙人接引而留下两具机器人替身的公孙瓒和袁绍(《赛博朋克化的中古史研究》)，索耳都合理地技术工具加入角色的肉躯之中，以此探索被工具置换过的人道主义。这种写作策略背后正是索耳的形式自觉，它不仅没有使文本看起来目的明显或者风格过于固定，反而使得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更趋近于准确。因为索耳试图用语言游戏来否定本质性的东西，所以他采用的形式也就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装置，他在其中内置了反形式的意图，这能否可以理解为作者试图在去中心化的文本中重新发掘真实呢？

在《与轴博士度过周末》里，“小男孩”即是一个冰冷可怕的造物，他内心有着公式般准确且不容更改的意志力，并且与父辈所经历的国家核武器试验始终保持同频震动。“小男孩”需要借助长达二十年的“规训与惩罚”才能意识到：做一个受人爱戴而不是危险的公民。这何其荒唐，一个人要对血统和出身痴迷到什么程度，才会迫切地把自己送进监狱。为了体内有“核武器”的儿子？还是为了在科技炼金术中胜出？索耳或许不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否则他不会借“小男孩”之口，道出已经认清现有社会虚伪又脆弱的本质这一事实。在如此的赛博美学中，由于技术与感性经验的共存，人物会把越亲近的人看成最大的敌人，这让传统小说中那种道德理想失效了，现实主义的人本论述也受到了动摇。

索耳的写作更像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那是一种真诚的先锋，时刻保持关注的先锋。不论是《与轴博士度过周末》《乡村博物馆》，还是长篇《伐木之夜》，他都保持着“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式的态度，严肃地提示着我们：时代正处于不断被异化的现实当中。

**◎邱玉洁：**我选择观察的对象是1999年生的渡澜，今年她出了第一本个人短篇小说集《傻子乌尼戈消失了》。

渡澜是一位内蒙古的青年作家，草原深处的神话一直遥遥牵引着她走向宽容自由的文学世界。容貌变幻的自然之子乌尼戈、庞大丑陋却又善良温柔的怪物莫德勒图、毛茸茸的兽人幼崽嘎乐……当这些想象中的万物乃至“异类”成为主人公，渡澜的小说便获得类似诗人荷尔德林那种众生平等的灵性。她自由穿梭于经验性的叙事，检视其中若干存在的主题，包容万物的平等意志便在她笔下自由竟生。她将自己抛入自然哲思，在想象中观照永恒的人类世界，用记忆对抗存在的遗忘，最终呈现的是一片生命飞扬的灵魂图景、一场感官复苏的精神盛宴。

在渡澜的文学世界中，清晰的洞察和慈悲的凝望使她的作品具备一种崇高又神性的光

辉。宗教性的爱与凉凉贯穿其中，世间万物各归其位，所有受到伤害的人都选择顺从、和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渡澜的小说近乎一种洁白的童话。《傻子乌尼戈消失了》讲述了勒内·吉拉尔替罪羊神话里的原型故事变形：异族的乌尼戈承受了所有的暴力与污名，“但他似乎完成了一场完美而彻底的奉献”。死亡将他引入一种向死而生的、不断充盈的恒久与无限。渡澜期盼着善惡分明、生死的宗教，在作品中力图表现出“因循的残忍”。浓郁的宗教气质并未让她宽恕施暴者，但也并没有将命运交付给上帝，生死的“果”仍然取决于人类行为的“因”。渡澜在她的哲学里实现对宗教的超越，以人类自身意志拥抱接纳了原罪，并给予他们应有的宽恕与垂帘。

写作对渡澜来说，意味着打破隔板。而隔板后面的暗影里，藏着某些不变的东西。不断复现的死亡是她笔下非常重要的意象。除去乌尼戈一篇，《美好的一天》《金甲虫》等都是从记忆层面进行阐释。死亡的那一时刻意味着物理时间的终结，所有的现在飞速逃离，无法追回，落入脱轨的时间长河。直至记忆消失，悲哀才就此浮现。人类的本质难以抵抗时间消逝，但在生命却是永恒的。肉身之死在渡澜笔下是通往永恒的跳板，它是万物始终、一切轮回的起点。

初读她的小说，会被绵密飞扬的诗意震惊，仿佛踏上一列火车，开启语言的冒险。渡澜之前一直学习蒙语，也许有这样的经历，使她的语言充满异质色彩。飞驰的想象使她的叙事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与自由，而语言却有一种静默恒常的内蕴力量。这种力量带领读者向内逃离，实现自由之境抵达。而另一种激情迷狂的特质，则是自由渡澜在文本中蕴含的实验性的“自我”所造就。她习惯将文本中的人物塑造为一个双性结合体，并将自己寄生其中，使语言结构呈现出一种密不透风、难以摧毁的神奇景观，非常具有辨识度。

渡澜在采访中坦言，自己想写的是一种“人对平静的渴望与人类记忆的顽固”，并以残忍而诗意的语言演绎到极致。这种极致充当生命的探索者，预示了一种人类久远恒常的存在状态。人类的记忆那么遥远，而渡澜关于人类的写作也才刚刚启程。也许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却足够惊艳，展现出青年写作的锐气、锋芒与野心。

渡澜在采访中坦言，自己想写的是一种“人对平静的渴望与人类记忆的顽固”，并以残忍而诗意的语言演绎到极致。这种极致充当生命的探索者，预示了一种人类久远恒常的存在状态。人类的记忆那么遥远，而渡澜关于人类的写作也才刚刚启程。也许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却足够惊艳，展现出青年写作的锐气、锋芒与野心。

渡澜在采访中坦言，自己想写的是一种“人对平静的渴望与人类记忆的顽固”，并以残忍而诗意的语言演绎到极致。这种极致充当生命的探索者，预示了一种人类久远恒常的存在状态。人类的记忆那么遥远，而渡澜关于人类的写作也才刚刚启程。也许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却足够惊艳，展现出青年写作的锐气、锋芒与野心。

渡澜在采访中坦言，自己想写的是一种“人对平静的渴望与人类记忆的顽固”，并以残忍而诗意的语言演绎到极致。这种极致充当生命的探索者，预示了一种人类久远恒常的存在状态。人类的记忆那么遥远，而渡澜关于人类的写作也才刚刚启程。也许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却足够惊艳，展现出青年写作的锐气、锋芒与野心。

渡澜在采访中坦言，自己想写的是一种“人对平静的渴望与人类记忆的顽固”，并以残忍而诗意的语言演绎到极致。这种极致充当生命的探索者，预示了一种人类久远恒常的存在状态。人类的记忆那么遥远，而渡澜关于人类的写作也才刚刚启程。也许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却足够惊艳，展现出青年写作的锐气、锋芒与野心。

渡澜在采访中坦言，自己想写的是一种“人对平静的渴望与人类记忆的顽固”，并以残忍而诗意的语言演绎到极致。这种极致充当生命的探索者，预示了一种人类久远恒常的存在状态。人类的记忆那么遥远，而渡澜关于人类的写作也才刚刚启程。也许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却足够惊艳，展现出青年写作的锐气、锋芒与野心。

申霞艳、黄魏越、林荷珩、古格妃、许哲煊、邱文博、邱毓贤等7人正在讨论中

# 以同乐诗篇荟萃湾区记忆——共读吴君《同乐街》

**申霞艳(主持人语)：**这期我们暨南大学“明湖读书会”共读的是吴君的新作《同乐街》，该书以一条街来承载城市遇合、新旧交替的“危机”时刻，属于典型的现代都市叙事。吴君尝试将家族、代际、性别、身份等诸多矛盾融入同乐街由小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型的过程中，“问题家庭”陈家在同乐街集体的帮扶下终于重回正轨，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精神一道沐浴湾区崭新的朝阳，感受“万福”“同乐”的召唤。作品在深圳与香港的双城镜像书写、同乐街与京基百纳的空间对比中探索大湾区新主流文艺的书写方法，令人印象深刻。吴君不断拓展的写作主体、双城镜像书写、新旧叙事空间对比、凝聚湾区记忆、努力建构美美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等诸多方面都值得这群生活在湾区的读者深入讨论。

**◎黄魏越：时代巨变下的“同乐”传奇**  
我们谈大湾区文学很容易想到打工文学、移民文学，吴君特别关注本地人面对改革巨变的问题。《同乐街》延续了《生于东门》《万福》等作的思考。陈有光一家是农业文明的天然纪念品，与跟随时代政策进入现代文明的同乐街格格不入。同乐街变成了同乐街，土话逐渐被普通话代替，同乐村的村民都通过合作社或自行经商的方式改变了生活，成功被纳入现代商业文明中。而陈有光生疏的电脑技能和对新政策的不理解，让他与这些文明成果无缘。他延续农业文明中对土地的坚守，等待拆迁赋予土地新的价值，让土地繁衍新的财富，孕育他的未来。贪婪和懒惰是他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原因之一，但吴君看到了这背后他作为普通人的无助。短篇小说《生于东门》是《同乐街》的故事雏形，在《生于东门》中，赔款被父亲挥霍完的陈雄因病无力再供养儿子陈小根，选择将儿子过继给香港商人，一家三代人无助、被动地等

待命运的判决。在《同乐街》中，吴君没有让陈有光一家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巨变的浪潮中，而是让“90后”女干部欣欣成为他融入新时代的引路人。时代的发展犹如过山车，每当弄潮儿创造新的时代传奇时，就有人被抛弃在站台上目送列车远去，适者生存是不变的丛林规律。在残酷的优胜劣汰外，在为时代弄潮儿欢呼呐喊时，吴君选择“拉”一把被遗忘的普通人，创造个人神话之外一个关于“同乐”的传奇。

**◎林荷珩：以一条街为深圳作伴**  
《同乐街》暗合时代轨迹，有意使同乐人的命运与深圳的发展遥相呼应。小说剖开城市的一隅，细致铺写在京基百纳光芒遮蔽下，同乐街居民的人生百态，展示了深圳这座城市在“紧张急管”的扁平表象背后真实鲜活的纵深形态。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同乐街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间不同身份立场的人们在时代变量的作用下，形成了更具有象征意义的生命轨迹。身处故事中心的钉子户陈有光一家，表面上是同乐街发展中亟需化解的“顽疾”，实际上作为典型的问题家庭，代表了城市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必然会出现的个体困境，也外化了同乐人站在风口前的茫然失措。面对深圳日新月异的情景，同乐人高傲与自尊的“本地人宣言”背后，充满了画地为牢的落寞和时不我待的迷惘。而同乐人的故事无疑也是深圳的故事，这种与脚下土地的脱节感与冲突感正是深圳与其他地域书写的不同之处。高速发展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错位，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城市品格。回忆与展望的并置贯穿全书，重绘了深圳发展的脚印，书写了时代的寓言。最终，陈有光一家的生活步入正轨，也寄托了人们融入城市动态、共同奔赴美好生活的愿景，使故事的叙述回到“同乐”的落点。作为原住民的同

乐人，联结着深圳的过去与未来。深圳生长的脉络浓缩在同乐蜿蜒曲折的街道中，同乐街里每一个人的历史都是深圳的历史。

**◎古格妃：探索新主流文艺的叙事方法**

吴君在《同乐街》中建立了改革开放与新时代湾区发展的连续性叙事，通过重建以共同体为核心的价值观，将“共同富裕”的理想理念重新带入到当下的深圳城市空间。小说开篇即是明显的空间对比：京基百纳时尚的建筑象征高度的现代化，一街之隔的同乐街则代表陈旧的村居。在吴君眼中，改革开放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她将深圳置于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中考察。四十年后的今天，随着高科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越是大都市，科技含量越高，职场竞争就越激烈。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深深地感受到被时代淘汰、被同行内卷的压力以及个体的无力。关于个人奋斗的神话不断消解，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成为《同乐街》的内在动力，旧的主体的失措、逃避与新的主体的新生、成长都落在了“同乐合作公司”这个集体之中。社区干部与基层群众之间的情感联结让集体的意义凸显。文末的“我们同乐人的大事记”则是身处在深圳这一空间中的具体的个人和集体、时代的发展共振的历时性体现。《同乐街》鲜明的时代性和在地性，体现了吴君对当下深圳现实题材的关切与关怀。

**◎许哲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与展望**

书名由《晒米人家》改为《同乐街》，表达了强烈的共同体愿景。“我们一直都在”贯穿始终、首尾呼应，可谓画龙点睛。在结构上，先是自小处着手，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陈有光若固守旧观念，是阻碍发展的钉子户；但若融入集

体，发挥拓荒牛精神，则是时代发展的螺丝钉，他的存在体现了个体与集体的深刻联结。在社区帮助下，陈有光对集体由憎恶到认同的心理转变，则是共同体意识于个体内心发酵的过程。同时，陈家的破碎与重建，与陈有光对同乐街集体认同感的波动是一致的，“家”在此是共同体的隐喻。《同乐街》着重书写的社区共同体则是现代共同体的基层实践。合作公司以合作化形式为改革浪潮中的深圳农民守住防线，努力纠正了错而跟不上时代的人，鼓励纠错就改，全民“同乐”。作者对此探取各群体的典型人物进行塑造，既包括合作化探索道路上的三代领导干部与新人后浪，也涉及形形色色的居民百姓。此外，该书也展现了对更广阔意义上共同体的展望。同乐人的观念由固守到开放，从怀旧抱怨到放眼未来，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在时代浪潮中走向现代化的深圳人的生动写照。由一人之乐到一家之乐，再到一个社区之乐，由社区的同乐走向深圳的同乐，再走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同乐，其背后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同乐，是全球视野下的现代化实践。共同体意识由陈有光一人出发，放大到全世界。

**◎邱文博：问题家庭的唤醒和引领**

吴君说《同乐街》是一个关于唤醒和引领的故事。小说的主体是被时代遗弃的问题家庭重新振作，融入“同乐”之潮。陈有光作为问题家庭的轴心人物，是导致家庭出现裂缝、产生畸变的元凶。剑拔弩张的夫妻关系、针锋相对的婆媳关系以及充满怨与恨的父子关系，使陈家的每个人都深陷“过去”的沼泽，难以逃离。吴君用细致的笔触聚焦问题家庭的矛盾日常，通过琐碎的生活细节，为读者鲜活地构建了由无赖的丈夫、软弱的妻子、叛逆的儿子、怨愤的婆婆以及沉默的公公组成的问题家庭。吴君将问

题家庭置于同乐社区这一空间之中，透露出问题家庭的最终归宿：身处同乐之中，注定融入同乐。陈有光一家作为同乐街不和谐的存在，并未因其“另类”“难缠”而被社区抛弃。相反，一代又一代同乐当家人竭尽心血、接棒接力，拯救破碎不堪的陈家家，唤醒困在过去的陈家人，引领他们找寻人生新的方向。结尾处，“陈有光再也不想离开同乐了，同乐是他陈有光的命”，一束温暖的光照亮社区干部和基层群众。在城市化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当下，吴君用一部《同乐街》向我们讲述着关于社区集体和问题家庭的故事，慰藉着每一个努力生存的普通人，歌颂着一直付出的社区干部集体，诉说着她对深圳的祈愿和祝福。

**◎邱毓贤：摒弃身份之隔，抵达“同乐”之境**

《同乐街》将人与人之间悲喜共感、责任同担的温情融进新时代的发展诉求里。在众多文学作品渲染集体的压抑与个体的孤独之时，这本小说反其道而行，从题目的命名便表达出一种素朴久远的祈盼，即“共同欢乐”。故事的发展逻辑是懒汉蜕变与干部成长的双线叙事，隐隐呼应着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然而《同乐街》的自身特质仍十分明显。穿插着粤语的鲜活日常、老同乐人与新同乐人的认知纠葛、政策变迁的得失等生活细节展现了未能及时现代化的深圳社区的自然皱褶，并延伸至基层治理的真实世界。懒汉陈有光兼有阿Q式的认为“祖上阔过”的自尊自大与耍滑无赖，干部钟欣欣具备基层新人屡屡碰壁却锲而不舍的理想人格素质。非明晰排序的事件线索渲染出一团乱麻的氛围，使读者追近钟欣欣极度的烦闷与无奈。钟欣欣心理空间的细腻还原消融了模式化的干部形象书写。同乐社区三代干部们的不同举措形成复杂的历史争辩，既超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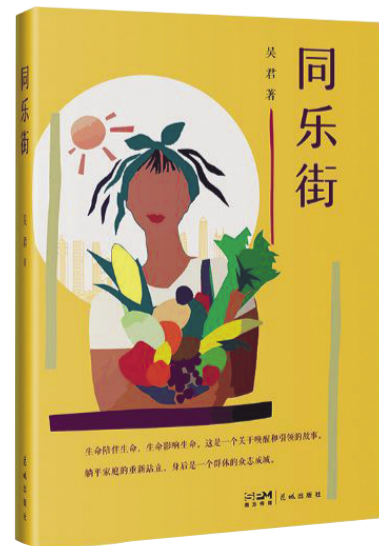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明湖读书会

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当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与在地群众之间的互动启蒙，又牵引出对单薄的理想主义与短视的求利主义的自我反思。“而这正是深圳最好的季节”将皆大欢喜的结局收束，导向了明亮昂扬的未来。小说最终呼唤的不是将集体利益置于首位的简单答案，而是软弱无力的个体与失去方向的共同体深切联结的可能性。城市的冷漠与人心的隔膜不再绝对，温情成为吴君书写的深圳新故事的珍贵底色。